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今年是中日建交五十周年，在新冠變種病毒Omicron肆虐下，兩國領導人會否舉行隆重的實體紀念活動尚未可知。不過，在後疫情時代下前瞻兩國未來的關係走向，倒是值得中日問題專家學者關注的重要議題。敝刊歡迎學者惠賜鴻文，為我們作深入闡釋。

——編者

方言與地下黨員的生命體驗

中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各地習俗、文化、飲食、語言等差異明顯。如果說1927年前的中共革命還是帶有地方特色的區域活動，那麼大革命失敗後，無論是在根據地還是在白區，中共黨員的跨區域調動便成為這一時期新的組織形態。以往研究普遍認為，黨內調動一方面來自中共中央對於革命形勢的判斷，另一方面也在處理派系糾紛、調整權力格局中發揮作用。李里〈革命與方言：中共白區黨員跨方言區調動與組織運作探析（1927-1935）〉（《二十一世紀》2021年12月號）一文，將黨內調動與黨員方言聯繫起來，頗具新意。

事實上，就方言而言，在五四時期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學校園中，學生就已開始討論各自家鄉的方言，甚至對此有專門探討。因此，對於1920年代早期中共的創建與發展，各同志間對於適應方言已稍有經驗。然而，隨着共產運動向工人階級滲透，在對工人的宣傳中，如何將精英詞彙轉化為大眾可以聽懂和接受的市井語言，成為早期中共亟需面對的問題。李文注意到，在北京長辛店的工人運動中，黨員具備一定的方言技巧，能夠拉進與工友的距離，這對組織罷工幫助明顯。

更為創新的是，李文將黨員的口音與生命安全聯繫起來，認為黨員只有盡量模仿當地口音，才能夠更好地掩護身份，完成黨的任務。大革命失敗後，身處白區的黨組織為了生存和更好地適應所處環境，常常通過黨內調動來達致黨員慣用語言與地方情境的融合。在這其中，李文甚至注意到北方與南方不同的調動特點。

然而，值得商榷的是，李文似乎缺少對中共內外情勢的整體關照。舉例而言，1930年代，在「立三路線」影響下，激進的軍事暴動成為各地組織的重要工作。在這一路線中，軍

事技能、組織能力、地方威望是否在黨員調動中佔有更大比重？這時口音差異在調動決策中處於何種地位？1928年中共六大後，統戰路線抬頭，白區生存與軍事、統戰、社群關係密切相關。在此背景下，對黨員口音的要求是否隨着生存處境的變化而時緊時鬆？

最後，對於地方黨組織經常出現的本地、外來幹部衝突，本地幹部是否以外來黨員口音不適為由對其進行排擠？要回答這一問題，似乎還應關注到該地黨組織的構成背景、派系關聯、性格差異，甚至要對其成員參與革命的動機等因素進行綜合考察，以此甄別黨員所謂「口音」問題背後所隱藏的複雜糾葛。

許良 上海

2021.12.26

如何看待抗日戰爭戰略稱謂與分期？

李黎明〈抗戰戰略稱謂及歷史分期的考異與辨正〉（《二十一世紀》2021年12月號）一文充分利用開放的材料，系統地對「持久戰」、「持久消耗戰略」與「持久戰略」三種不同的戰略稱謂進行考證，這為抗戰史研究提供極大的幫助。文章提到這三種稱謂的緣起各有所本。這三種稱謂並非同時產生，但彼此卻相互影響。第一種稱謂「持久戰」係1937年8月20日蔣介石頒令的〈大本營訓令第一號〉中提到以「持久戰」為作戰指導；第二種稱謂「持

久消耗戰略」則源自於陳誠的論述，受到戰後的著作多次引用與轉引，這也間接導致後續作者在未經查證下的錯引；第三種稱謂「持久戰略」是1973年蔣緯國在未引據史料下提出的，此後諸多論著深受其影響，尤其是軍隊將校與軍事史學界的著作。對於抗戰歷史分期差異及與三種稱謂的關係，李黎明分別從國民政府相關人士對抗戰史的主張進行探討，認為他們在分期問題上有着不同構想與戰略闡釋。其中陳誠與蔣緯國強調階段性的「游擊戰」用兵戰略，按照時間序列、敵人戰略改變、盟國立場轉變等因素，將抗戰分為三個時期，不過這種對抗戰戰略的詮釋偏離蔣介石以「持久戰」作為作戰指導的戰略意圖。

作者認為「持久消耗戰略」與「持久戰略」的用詞不符史料記載，而蔣介石也未賦予「持久戰」以「戰略」意義，三者並非「同義詞」而只是「近義詞」。然而，這三種稱謂的主張者之間彼此從未相互否定。況且，特定的戰略稱謂是否符合當年抗戰的本質？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必須思考當時中國國力是否能夠抵抗一個經過現代化洗禮的軍事強國。運用「持久戰」與「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來「以拖待變」似乎是最佳的選擇。事實也證明，爭取國際的介入與調停，一直是蔣介石殷殷所盼。從一開始的「日蘇先戰」到後來希望蘇聯出兵介入，都說明蔣介石明白中國難以獨自面對日本的侵略。

其實蔣介石乃至國民政府對於整個抗日戰爭是否有全盤

性的規劃與戰略目標？或是隨着戰局的變化而有所調整？這或許就不難理解為何陳誠與蔣緯國在日後對此有自己的一套定義。不過，在抗戰稱謂與分期的議題上，學界應保持更加嚴謹的態度，而李黎明用史料給予「正名」，為學界樹立了良好典範。

林威杰 上海
2021.12.30

西藏問題的複雜性與多邊性

陳力的〈派系之爭：宗派主義下的西藏工委（1950-1958）〉（《二十一世紀》2021年12月號）實乃佳作，值得推薦。就大範圍言，其所論新中國初期「西藏和平解放」的歷史，是個老問題，但作者卻聚焦於「宗派主義下的西藏工委」這一新視角，細緻地考證了中共內部西南、西北兩局之宗派爭拗，如何在長達七年的時間內，造成了西藏工委內部工作的矛盾與衝突，實質性地影響了達賴噶廈政權與十世班禪勢力的關係，並對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高層解決西藏問題造成了某種程度的誤導，認為局勢提供了更多迴旋、伺機而動以掌握主導權的條件。讀罷深感作者掌握材料的全面、新穎，以及解讀材料的史家功力。不過本人感受最深者，是陳文所具有的豐富的閱讀啟發性。

首先，我們從中看到了新中國初期西藏問題的風雲起伏，與中共內部的派系之爭具有複雜的關係，這樣過往的二元關係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就變成了「兩方四邊一主」之結構，即「藏方—中方」之兩方，

「達賴噶廈政權、西南局—十世班禪勢力、西北局」之四邊，以及中央高層之主導。以這樣的多邊結構來看待「西藏和平解放」的歷史，將可能產生更多的新發現和新闡釋。

其次，由陳文向中共內部關係深挖下去，或許也有助於更為深入地理解毛澤東、高崗、彭德懷、鄧小平等高層之間的關係。其實中共內部不同觀點、派系之間的差異與緊張關係，之於西藏乃至更廣泛的民族問題的影響，遠不止於新中國初期的西藏。例如1980年代初期民族政策的「撥亂反正」，西藏、新疆政策的大幅度放寬乃至波動後的相對收緊（尤其是新疆）等，都與中共高層不同派系的分歧或矛盾直接相關。

再次，陳文所隱含的研究方法，也同近幾十年來國際學界的某種研究傾向內在相通。比如劍橋大學教授寶力格（Uradyn E. Bulag）對晚清至內蒙古自治區建立之歷史的「協作式民族主義」研究，再如美國卡爾頓學院教授哈立德（Adeeb Khalid）對於現代烏茲別克斯坦形成的研究，都表現出突破傳統二元對立的研究方法，更為複雜、多邊、動態地來把握相關歷史的演變之傾向。

不過儘管如此，現代民族國家生成、演變的歷史，總體上恐怕不是由複雜性、多邊性來決定的，而是由主導性權力決定的。至少中國的歷史就是如此：根本上是毛澤東、中共統一國家的意志與權力，決定了西藏、新疆、內蒙古的當代命運，而非複雜而多邊的博弈。

姚新勇 廣州
2022.1.8